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二十一世紀》為一本綜合性學術文化刊物，從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出發，致力於跨越「兩個文化」的鴻溝，所發表的文章着重原創性和思想性。本刊廣泛容納各種不同見解，歡迎各界學者惠賜鴻文。

——編者

## 情感史結合黨史的嘗試

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共早期組織化進程的研究，有側重於從革命者或革命團體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地理空間等角度分析中共早期組織在地方的發展，也有聚焦共產主義信仰在青年個體或群體中從傳播、接受到行動的演進脈絡。而許良的〈從個性解放到服從組織——中共早期革命青年的情感研究〉（《二十一世紀》2021年8月號）一文則注意到不同革命成員的情感差異與中共早期組織的運轉之間的複雜關聯。作者借用情感社會學的理論，從情感體驗、情感能量以及情感交往三個方面闡釋早期革命青年在中共地方組織的情感表現與實踐，還原青年個體與組織之間豐富的情感樣態，指出在中共早期組織尚未完善的情況

下，個人的情感活動對組織的運行影響很大，並因此產生了諸多問題。這對觀察早期地方組織的真實發展狀況提供了有益的視角。情感史研究並不是新取徑，但將情感問題引入中共組織研究尚屬少見，作者的探索值得讚賞。

中共早期組織濃郁的學生氣質以及在政治上表現出的不成熟，在許文中已有較多呈現。不過，此種不成熟性被單一地歸結為個體的情感差異，本身即值得討論，而認為這種情感差異是「導致早期革命組織難以有效協作的本質原因」，同樣需要更令人信服的論證。許文進一步提到，延安整風成功壓制了革命者個人的情感和內在意志。事實上，有大量的日記、書信等私人記述顯示，延安時期的革命者一樣內心澎湃、情感豐富，一樣經常陷入與自己、與環境的激烈交戰中。既然情感還在，為何組織特徵的確有明顯不同？這是不是表明個體的情感形態與組織特徵並非存在直接的因果關聯？是不是需要更細緻地去分析情感形態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進一步追問，或可發現個體情感與組織紀律約束之間的衝突可能沒

有想像中嚴重。以籠統泛化的個體情感形態來解釋中國組織不同階段的特質，或許存在簡單化處理的問題。

許文主要呈現青年的情感釋放與個性追求在組織實踐中產生的問題，較少涉及中共組織規範革命青年情感、收束個性的努力。沿着這個思路，或可進一步探究革命青年面對集體主義意識和紀律要求的反應。從中共成立到整風，這一過程中早期革命青年的情感能量延續到何時？與早期革命青年對黨組織產生的影響之間又有何關聯？不同時期的革命青年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嗎？這些都是可以延伸探討的問題。

王龍飛 武漢

2021.8.25

## 「刀刃向內」與「自我革命」

在中共歷史上，黨內鬥爭作為消除黨內分歧、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的重要方式，彰顯出中共「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的勇氣與智慧。

早期中共黨內鬥爭形式，具有鮮明的地域性與靈活性特徵。在未曾偏移中共中央總體理論指導的前提下，藉着相對獨特的黨內鬥爭實踐，能夠強化黨的組織和宣傳力量在地方社會的影響力。劉水展的〈福建蘇區早期的黨內鬥爭——傅柏翠與閩西特委分兵緣由再釋〉（《二十一世紀》2021年8月號）一文，以地方精英傅柏翠與閩西特委分兵事件作為研究切入點，通過梳理「閩西暴動」背

景下福建省委與閩西特委內部鬥爭情形，以及對分兵緣由的闡釋，揭示出劉少奇總結的黨內鬥爭理論在地方革命進程中的基本形態。

相較於蔣伯英、陳耀煌對分兵原因的探究，劉文突破之處在於將考察視角從權力、利益、路線與派系之爭進一步拓展延伸至分兵背景、權力背後複雜的人際網絡與政治安排，圍繞身份猜忌、權力排擠及思想與戰略分歧三個方面對分兵緣由進行了較為全面細緻的梳理。劉文通過檔案文獻的解讀，指出因福建省委代理書記陳祖康叛投第三黨引發的省委改組，致使省委實際負責人王海萍在黨內失勢而步入閩西推行暴動，這又導致王海萍不信任與陳祖康關係密切的傅柏翠，對其組織權力進行打壓，加之傅柏翠與閩西特委關於暴動政策存在分歧與爭論，最終以分兵收場。劉文由此提煉總結出鬥爭會、混淆黨內外鬥爭方法、派系鬥爭等早期中共黨內鬥爭表現形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劉文對福建蘇區早期黨內鬥爭的探討，以小見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窺探中共治黨理論的成熟度。略顯不足的是，劉文僅突出分兵事件所體現的中共黨內鬥爭基本形式，忽視了中共早期黨內鬥爭的深遠影響。黨內鬥爭是中共革命價值理念的傳遞過程，是中共用統一的意識形態整合個體，凝聚黨內共識的重要方式，如傅柏翠不僅具備社會身份，更擁有組織身份，閩西特委對其進行組織制裁的過程，也是在

引導傅柏翠努力兼顧雙重身份的過程，進而推進更為深入的「自我革命」。當然，中共當時作為一個新型政黨，黨內鬥爭形式也是在探索與「試錯」階段，難免出現問題，充分凸顯出中共革命進程中複雜斑駁的面貌。

梁晨暉 合肥  
2021.8.14

## 地方主義與整風運動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領導的早期武裝鬥爭，由於尚未建立全國自上而下的黨軍領導體系，往往由地方革命知識份子領導發動，與當地的社會習俗、人際交往、群體性格等元素有着密切聯繫。這些地方文化基因直接影響早期武裝鬥爭的成敗和革命的持久性，是深化中共早期革命鬥爭史和黨軍體制研究不容忽視的因素。

應星、榮思恆的〈西北革命根據地早期的黨內鬥爭——以劉志丹與謝子長為中心〉（《二十一世紀》2021年8月號）一文結合個人生命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視角，通過考察西北革命獨特的自然、歷史和政治背景，梳理西北早期革命的兩位中心人物——劉志丹和謝子長的生命史，解剖他們的不同出身和成長環境造成的性格差異，認為由此帶來的早期革命路線衝突和局部鬥爭，是後來「陝北肅反」乃至整風運動中反山頭主義的深層根源。該文以個人性格為基礎對早期革命領導人的生命史進行考察，可謂開闢了中共早期黨內鬥爭複雜機制研究的新視角。

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以地方革命知識份子為主導的武裝

鬥爭，呈現出鮮明的地方化色彩。地方革命領導人基於不同的成長經歷、個人性格和領導能力，在領導地方武裝鬥爭時展現出獨具特色的領導風格，同時不可避免夾雜了地方主義、英雄主義甚至農民意識等思想局限，雖然一時順應了地方武裝鬥爭的發展需要，然而從組織史的角度來看，這些領導作風塑造下的地方軍隊，缺乏嚴密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不利於革命的長遠發展目標。黨中央為了盡快扭轉武裝鬥爭中的地方主義傾向，先後派遣了大批中央幹部前往各根據地領導地方革命，旨在以中央派遣幹部為主導在地方建立具有嚴密組織紀律的一元化領導機制。這就不可避免與以地方文化為基因發展起來的領導風格有所衝突。在中央幹部試圖對地方幹部進行激進思想改造的過程中，在「左」傾思維的影響下，各個根據地都出現了程度不一的肅反運動。

因此，對地方早期黨內鬥爭的考察，不僅僅要「眼光向下」，深入挖掘地方革命領導人的性格特徵和生命史，而且要有整體觀照，認識到中央幹部對地方幹部進行改造的宏觀背景和歷史必然性。在這種整體趨勢下，地方革命領導人的生命史僅可作為導致肅反運動的局部因素，而不能解釋肅反運動的根本誘因。倘若該文能夠在全國範圍內中央幹部取代地方幹部的整體背景下，從個人生命史的視角探討早期黨內鬥爭的深層根源，或許能夠使我們對陝北肅反和整風運動中反山頭主義的誘因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陳杰 鄭州  
2021.8.20